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宋
元
明
清

巴蜀书社

译注 傅杰

审阅 许嘉璐 刘仁清

徐渭诗文选译

译注

傅杰

审阅

许嘉璐 刘仁清

巴蜀书社

一九九四年·成都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们的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

在我国明代文学艺术史上，有一位多才多艺、冠绝一时的天才，他就是徐渭。

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别署田水月，出生在一个日趋衰落的大家族中。其父徐鏊，曾任四川夔州府同知，晚年娶妾生下徐渭。徐渭出生后百日，徐鏊去世。徐渭嫡母苗氏，收养徐渭，后因家道中落，即将徐渭生母和一批仆人遣散。徐渭十四岁时，苗氏逝世，他随异母长兄一起生活。他的长兄比他年长二十多岁，跟他殊无感情可言。这样的家庭境遇，使徐渭自幼就深深感受到了“骨肉煎逼，其豆

相燃，日夜旋顾，惟身与影”（《上提学副使张公书》）的孤独。

徐渭聪颖好学，少有文名，八岁已能做八股文。十岁时，山阴县令刘曷对他面试后勉励他“多读古书，期于大成，勿徒烂记程文而已。”在后来的十余年间，徐渭弃“程文”（即八股文）而肆力于经史百家。其结果，一方面是植深了他的学养，拓宽了他的心胸；另一方面，则又使他科场失意，二十岁上才勉强考中生员，而此后的二十年中，八次乡试竟八次受挫。

他的婚姻也像仕途一样多舛。他二十一岁时入赘于潘家，婚后五年，十九岁的妻子就在分娩后死于肺疾。他本可继承兄长的遗产，却因入赘潘家诉讼失利，房产被有权势的无赖侵占。他没有资财，也没有了家，个人生活充满了不幸。

当时的明代社会，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用徐渭的话来说，是“方其权奸肆逆，虏寇冯陵，纷狐雄而鼠窃，实异恶而同狩”（《会祭沈锦衣文》）。就内而言，在位的明世宗，不理朝政，迷信道教，只祈长生，进谏的朝臣或被革职，或被定罪。而奸臣严嵩因善于迎合上意，得到世宗宠信，任辅相二十年，得以专擅国事，结党营私，致使贪贿公行，国库空虚。就外而言，占据河套一带的蒙古鞑靼部

右翼土默特万户首领俺答对明贡奉不时，又乘明朝政紊乱之机大举扰边；与此同时，自元末明初开始骚扰东南沿海的倭寇勾结豪绅、奸商、海盗，加刷了在浙、闽一带的侵扰，烧杀淫掠，致使许多工商业市镇受到严重的破坏。

徐渭曾师事王阳明的弟子季本，深研王学，亦兼通佛、道，但他更关注着社会现实。鞑靼南下时他相继写了《二马行》、《今日歌》等诗，表现出对边境安危的关切，并对权贵只顾享乐、无意战务的行径作了直截了当的鞭笞。他尤有志于保卫乡土、抵御倭寇。正是在这样的時候，他结识了时任浙、闽总督的胡宗宪。胡氏十分看重他的文才，屡次招他入幕府掌文书。徐渭一方面是对实现自己的济世之志特别是直接投身抗倭行列的愿望热切，一方面是感念于胡氏的知遇之恩，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正式入幕。

徐渭入胡幕后，支持并参与了胡宗宪主持的抗倭战事，得到的生活待遇也很优厚。但“文人而有出位之思，依傍门户，不敢从心所欲，势必至于进退失据”（钱钟书语），更大的悲剧也就从此开始。

胡宗宪有勇有谋，长于韬略，在平定东南倭乱中起了重要作用，就这一点而言，徐渭对他是钦佩

的。但是在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中，决定官吏升迁的不只凭个人政绩，更在与最高统治者及上级官吏的关系，在有没有靠山。胡氏的地位，是由严嵩及其党羽赵文华维护的。而徐渭反对严嵩一党的态度又很明确。他的知友沈鍊生性耿介，刚直不阿，终为严嵩所害，徐渭对此一直怀有强烈的义愤。他入幕后，代胡典文书五年余。其间，胡宗宪不断向严嵩及赵文华送礼致信，所有文字都交徐渭代草，类皆阿谀谄媚之语。徐渭曾自哀“渭于文不幸若马耕耳，而处于不显不隐之间，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抄代集小序》）基于这种矛盾痛苦的认识，他因此几度离开胡幕。虽然徐渭又数次被胡召回，但由于作文不是说真话，不是出于真心，那么有文之耻，甚于无文。这对素来受文以载道传统影响又还没有丧尽廉耻的徐渭来说，其心理的自我折磨是不言而喻的。徐朔方先生指出：“为此而引起的内心矛盾应是他精神分裂症的原因。”

（《论徐渭》）这是很锐敏的见解。徐渭在《抄小集自序》中说：“余夙学为古文词，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辞而百縻，往来幕中者五年。卒以此无聊，变起闺阁，遂下狱”，就透露了个中的消息。

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严嵩在御史邹应

龙的上书弹劾下被免职。胡宗宪亦因与严嵩的关系受到参劾。其年十一月，世宗下诏逮捕胡宗宪，解京治罪。宗宪至京后，世宗以其抗倭有功暂免处分。嘉靖四十二年十月，胡宗宪再度被捕，终于死在狱中。胡死后，胡府幕僚也多受牵连。加之徐渭才气逼人，不拘小节，早已受到天才们常易受到的忌恨。他感到了逼近的威胁，更感到深深的绝望。接连的不幸遭遇与沉重的精神压力，以及脑风加剧，使他终于发狂。他为自己写下一篇长长的墓志铭，回顾了自己走过的道路，决意自弃人世。他沉痛地说：“人谓渭文士，且操洁，可无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洁而死者众矣，乃渭则自死，孰与人死之！”他拔下壁柱上的铁钉击入左耳窍中，当即血流如注，昏死过去，医治数月，乃得痊愈。之后他或以斧劈面，或椎击阴囊，屡次自戕竟都不死，却在狂病的又一次发作中杀死了自己的继室张氏。

在第一个妻子潘氏死了十三年后，徐渭曾入赘于杭州王家，但以受到虐待，这次婚姻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结束了。次年（嘉靖四十年），胡宗宪为他续聘了张氏。徐渭对潘氏至老仍一往情深，再婚生活很难和谐；加之在他可塑性最强的岁月中因寄人篱下而形成的偏激敏感，患狂病后更是多疑易怒，终于酿成杀妻的惨祸。他因此被投进监狱，过了七

年负枷戴锁的犯人生活。在友人的救援下，于万历元年（1573）五十三岁时得以保释出狱。

出狱后，他参与了《会稽县志》的编撰。后经老友张天复子张元忬等的疏通，徐渭被正式释放。万历三年（1575）秋，徐渭开始在吴越游历。四年夏，应老友宣化府巡抚吴兑邀请，徐渭买舟北上。先是在北京小住，后出居庸关，至宣化府，到塞北边关巡访考察。后因体力不济，次年春即回到北京。其后，他曾回绍兴养病。万历八年（1580）初，徐渭再到北京。居京三年，徐渭以他诗文、书画、戏曲等方面的卓越成就，名动京师。但他“性纵诞，而所与处者颇引礼法，久之，心不乐”（陶望龄《徐文长传》），遂病发。万历十年（1582），徐渭长子徐枚把他接回故乡山阴。

其时，徐渭已到暮年。然而，与他为伴的，仍然是疾病与贫困，赖以度日的便是收薄租、卖字画，甚至于卖书卖衣物。他以诗文、戏曲、书画来寄托发泄他的情感，又写下《畸谱》，记录了自己不堪回首的一生。万历二十一年（1593），徐渭七十三岁。他在变卖了所有可以变卖的东西之后，伴着一堆残书旧稿，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他早已不再依恋的人世。

徐渭颠沛困顿，穷老以死。他的一生，是落魄潦

倒的一生，没有可以夸耀炫示的权势和金钱。但他自有他的自信，那就是他的艺术。徐渭的著作很多。他所留下的《徐文长三集》二十九卷（附杂剧《四声猿》一卷）、《徐文长逸稿》二十四卷、《徐文长佚草》等诗文、戏曲作品和《青藤山人路史》、《畸谱》、《文长杂记》、《南词叙录》、《笔玄要旨》等著述，奠定了他在我国文学艺术史上引人注目的地位。他自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这个名次上的排列，后人未必完全同意，但他在诗文、书画、戏曲等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却是不容置疑的。权势滋生腐败，金钱滋生贪婪，唯有从艺术中才产生出不朽。徐渭——这个生前饱受了苦难的“畸人”，而今已成为他的祖国的永久的骄傲。

二

徐渭现存诗二千一百余首，文八百余篇，写作的数量多，时间长。他的诗文尤其是诗歌创作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复古思潮，给“诗道荒秽”的文坛带来了全新的气息。

明弘治时，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力倡复古；至嘉靖中，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

七子”又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他们的文学主张是对宋元诗文流弊的反动，自有其历史的意义。但风气所及，则不免流于剽窃模拟，他们像临摹古帖那样摹仿古人的诗文，结果便产生出大量“维肖而不维妙”的假古董式的作品，所谓形骸神索，了无生意。徐渭对此深为不满，在《叶子肃诗序》中他刻薄而恰当地把以摹拟为能事的“今之为诗者”比为“鸟之为人言”，并进一步看出，形式上的摹拟其实正表现了思想上的贫乏，没有真情实感，偏要装腔作势：

古人之诗本乎情，非设以为之者也，
是以有诗而无诗人。迨于后世，则有诗人
矣，乞诗之目多至不可胜应，而诗之格亦
多至不可胜品，然其于诗，类皆本无是
情，而设情以为之。夫设情以为之者，其
趋在于干诗之名，干诗之名，其势必至于
袭诗之格而剿其华词，审如是，则诗之实
亡矣，是之谓有诗人而无诗。（《肖甫诗
序》）

我们读到这样的话，也禁不住会想一想，直到今天的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也还存在冒牌的诗人太多而真正的好诗太少的情况。从这样的批评中，我们不难想见徐渭对于诗文创作的正面主张，同时也已能窥

见徐渭的文风与个性，那就是任情率意，不拘形迹，而充分表达出真实的真正的自己。

徐渭的创作认识与创作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发展变化，又与他特殊的生活经历相关联。他的《张母八十序》说：“予顾逡巡庠序中，庶几一飞而屡坠，既乃触网罟，谢去其中衫，益一意于颓放”；《书草玄堂稿后》说：“渭之学为诗也，矜于昔而颓且放于今也”。前者是说行为，后者是说诗风，都用了“颓放”一词，正显露出二者内在的相关性。他个性中本有“疏纵不为儒缚”的一面，生活道路的坎坷更使他与世格格不入的性格得到了自由的也是自然的发展。这种心态不仅表现在思想上，更表现在他的艺术和文学创作中。他的诗作无论构思还是语言，都有前不见古人的奇崛险怪，令人读来始而瞠目结舌，继以拍案称绝。例如他的《四张歌》，语言俚俗生动，章法纵恣奇特，构想怪诞不经，却又巧妙合情，使我们一时想不起一首类似的祝寿诗来。又如他在《赋得百岁萱花为某母寿》中以“阿母但办好齿牙，百岁筵前嚼甘蔗”来表示对邻家老母的衷心祝福；在《沈生行》中以“请看小李继家声，好驴不入驴行队”来表示对忠臣之后的殷切期望，其言都突兀而出人意外，淋漓地表达出自己的真情。袁宏道评其诗“一字一句自

有风裁，愈粗莽，愈奇绝，非俗笔可及”，“才思奇爽，一种超轶不羁之致，几空千古”（商景哲《刻徐文长集原本述》引），确不愧为知音之言。徐渭并不是在形式上刻意求奇，否则他与刻意摹拟的复古派们也就殊途同归了。他只是要把自己的所历所感说尽说透，以彻底展露自己的个性，表达自己的感情。有助于此的，什么形式语言都无避忌地使用；有碍于此的，什么戒律清规都无顾虑地打破。这样说出的才是“出于己之所自得，而不窃于人之所尝言”的“人言”，才是有“自我面目”而不同于“优孟衣冠”的一家之言。

他的诗中充满了他本人的形象，他的笔也一直没有离开现实世界。除了《廿八日雪》、《少年》、《二马行》、《海上曲》这些直接描写现实的诗歌外，他的咏史咏物诗中所体现出的感情也无不鲜明地印上了他个人身世的标记，使我们更婉曲地看到他对现实的感慨。比如咏史诗中《淮阴侯祠》、《伍公祠》，借古人之酒杯以浇自己之块垒，可以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他的隐痛。又如咏物诗中的《墨葡萄》表达怀才不遇的悲愤，《牡丹》倾吐不慕富贵的孤怀。即便语短意深，都能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物后之人的情怀。他的咏物诗以题画者居多。由于作画往往是他感情充沛时用来抒发喜悦或宣泄不平的一种手